后疫情时代下的〝未来学〞和高等教育

威廉·洛克

威廉·洛克（William Locke）：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the University of Melbourne）教授、墨尔本高等教育研究中心（Melbourne Centre for the Study of Higher Education）主任

电子邮箱：william.locke@unimelb.edu.au

没有什么比一场适当的危机更能激发人们对不同未来和新开端的想法。至少，我们现在被告知：将会出现“新常态”，不会回到新冠疫情之前的情况。然而，即使在疫情之前，也有很多未来学家，尤其是在英语国家，分析了高等教育一系列灾难性情景。在这些情景中，各种因素结合在一起，挑战并扰乱公立大学的传统学术惯例、商业模式和工作实践。一些人推测到，这些转变可能会威胁到高等教育的基础、经济价值和社会角色。

这些情况通常包含以下所谓“干扰因素”的某些组合：毕业生就业的转变；提高学生的期望；技术革命，包括在线学习、数据分析和人工智能的广泛应用；扩张与公共融资约束；政策突变；以及日益增长的全球竞争，特别是来自新兴国家私立营利性机构和大学的竞争。现在，前沿的未来学家将新冠疫情造成的快速影响也加入了这些干扰因素讨论，并唤起了人们的焦虑。

未来学家的话语

未来学家，通常是管理顾问、“思想领袖”和记者。他们预测未来将给那些在大学管理和工作的人带来快速和持续的变化、挑战和不确定性。作为回应，这些管理人员和工作人员将需要从根本上改变自己，以适应这些新的条件和要求。特别是，未来的学术“劳动力”必须更加“敏捷”、“灵活”、“专业化”，并服从更大的“专门化”。安永会计事务所（Ernst and Young）甚至预测，学者们将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在几所高等教育机构和知识企业工作的自由职业者。

因此，有人认为，必须克服公立大学的保守主义、“竖井心理”（silo mentality，又称“孤岛思维”）、对跨学科和实用知识的抵制、对“低价”值课程的多虑，当然还有固有的缓慢变化步伐。传统的高等教育“劳动力”将不得不被解散。这种观点认为，在全球疫情及其对生命、社区和机构的颠覆中，这些必要的转变将会加速。

一个有缺陷的方法

这些自封的高等教育专家主要对大学校长、政策制定者以及主要利益相关者（如企业领袖和毕业生雇主）进行了访谈与调查。但他们很少征询在高等教育院校工作和学习的教职员或学生的意见，更不要说参考有关世界各地高等教育系统发展和趋势的现有学术研究。然而，这种“未来学”在有影响力的网络中传播，并开始为机构内当前的战略制定以及国家、国家和全球各级的政策制定提供信息。因此，它不应该被简单地视为投机营销而不予理会，而应该被视为一种对行为和决策具有影响和实质性影响的话语。

“灾难性的未来学”讽刺了现有的公共高等教育模式。大学被认为是传统的“二十世纪”机构，以学术为导向，而不是以学生

或客户为中心。它们的特点是彼此过于相似，并且由不愿改变的老龄化学术劳动力所主导。未来学家几乎只引用以前的管理咨询报告、政策文件和报纸文章。他们反复使用那些已经变得非常熟悉的神话和民间传说，但坦率地说，这些经不起实证检验。

基于证据的学术工作

未来学家忽略了许多关于学术工作的现有研究证据。例如，他们认为学术职业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同质化的，绝大多数学者都是长期职位，既从事教学又从事研究。证据表明并非如此。关于学术“职业”的多样化、进入者的范围之广（包括来自其他职业的人）、他们选择的不同职业道路以及线性学术职业的侵蚀等方面的研究文献层出不穷。此外，近年来在英国、澳大利亚和美国，兼职、定期、临时、纯教学和非终身制的教师都有很大的增长。

以证据为基础的方法展望未来

与这些说法相反，我们应该根据当前最好的研究证据和对近期、中期和长期过去趋势的分析，对当前情况进行准确的分析。这必须包括对现有有效和成功做法的例子进行严格分析，这些例子可以为未来的发展提供初步的说明。欧盟资助的“未来大学”（Universities of the Future）项目和林肯大学（the University of Lincoln）的“21 世纪实验室”就是两个例子。

更多基于证据的、反复设想未来的方法可以确保我们评估影响当前趋势的各种因素，包括社会文化、政治和环境（甚至是准非法的）因素，以及经济和技术因素。这样，我们就可以避免简化主义的方法，即特权特定的活动以及优先考虑特定结果的决定论假设。

新冠疫情是终极破坏者吗?

那么，新冠疫情是最终的破坏者吗？这无疑为未来学家提供了大量的素材。我们被告知，“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时代”，而且，高等教育部门作为一个整体正在紧缩，以及如此多的单个大学裁员，确实是罕见的。然而，在战争之前也有过混乱，包括内战、民族主义运动、入侵、大规模移民，所有这些都对世界各地的大学造成了严重影响。过去也有过裁员。在 2008 ~ 2009 年的金融危机之后，许多国家的高等教育系统出现了紧缩，工作人员转而缩短工作周数，并采取减薪、自愿和强制裁员计划，以换取大多数人的工作保障。

我们还被告知“不会再回到过去的正常状态”，但大多数大学目前关心的是短期到中期的生存，不愿过多地改变他们的商业模式和操作方式，因为担心崩溃。危机不是开始制定新战略的好时机，即使旧战略可能已经支离破碎。当大学有资金进行创新时，他们觉得没有必要这么做；但是现在当他们确实需要更新他们的活动时，他们没有资金来投资管理必要的变化。

当然，这一切对管理顾问来说都不是好事，他们将因大学财政紧缩而蒙受损失。所以，也许是时候让大学掌握自己的未来了。

注：本文摘自《为变化的世界变革高等教育》（Changing Higher Education for a Changing World）一书的章节（由 Callender，Locke and Marginson 主编，2020 年由 Bloomsbury 出版社出版）。该书基于全球高等教育中心（Centre for Global Higher Education）的研究课题，由英国经济和社会研究委员会（Economic and Social Research Council）资助。